

张生 等著

日伪关系研究

以华东地区为中心

南京出版社

日伪关系研究

——以华东地区为中心

张 生
潘 敏 周宗根 著
李 峻 李先明

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伪关系研究/张生著. —南京:南京出版社, 2003
ISBN 7-80614-841-8

I. 日... II. 张... III. 汪伪政府(1938)—中日关系—研究 IV. K2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0751 号

日伪关系研究
——以华东地区为中心
张生 等著

*

南京出版社出版
(南京市成贤街 43 号 邮编 210018)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雄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300 千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

ISBN 7-80614-841-8
K·89 定价:22.00 元

序

张宪文

张生同志和几位青年学者合作的新著《日伪关系研究——以华东地区为中心》即将出版，我向他们表示祝贺。

汉奸问题本是中华民国史中一个较少有人研究的领域，资料缺乏，研究人员较少，加上一定的敏感性，使其在长时间里被人为地忽略了。反而是国外学者，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了一些著作。80年代，由于蔡德金、黄美真、余子道、张云、石源华等人的努力，民国时期汉奸史的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批有质量的论著问世，使我们加深了对汉奸及其在民国历史上作用的了解。近年来，魏斐德、蒋永敬、傅葆石、萧邦齐、巴雷特等一批海外学者重新加强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张生同志对日伪关系进行了新的研究，以华东地区为中心，对日、伪之间既合作、勾结，又有矛盾、冲突的复杂历史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们剖析了中国历史上汉奸的行为规律，对中国传统文化未全面清算“汉奸文化”及其成因也作了分析，提出汉奸影响中国历史具体走向的观点。他们论述了日本利用汉奸的政策、策略对华东地区汉奸和伪政权的影响，并按政治、经济、地方政权、个别汉奸的内在逻辑，分专题实证地研讨了“清乡”、“粮食政治”、上海伪地方政权和李士群特工势力兴衰中的日、伪复杂关系，得出一系列的新见解，令人信服。本书尤其着力于国民党和中共对日、伪关系的制约，提出国、共、日、伪四方的复

杂互动,使抗战时期华东地区的政治态势呈现出非线形的格局,深化了伪政权史的研究,在海内外史学界是新的研究成果。总的说来,这本专著资料丰富,结构完整,叙事生动,解剖较深,相信他们的成果,对推动民国史研究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值得提及的是,近年来,由于价值多元化,加上一些人的故意炒作,对汉奸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产生了一些不良倾向,比如,有人质疑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有人说汪精卫也有救国的理想和实践。张生同志等一方面进行学术的客观研究,一方面也依据史实对这些错误的观念进行了辨析,既不教条,也不媚俗,我认为这种学术态度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张生同志进入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已有多多年,一直以思想敏锐、知识面广得到学者们的赞赏,和我本人也有很多重要的学术合作。目前,正是他当写之年,相信他一定会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张宪文

2003年9月

导 论

所谓汉奸，“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族或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叛徒”^①。在学术界有人有意无意把“汉奸”想当然地理解为“汉族的奸细、叛徒”，从而不必要地制造出“问题”的情况下，重温它的定义，是我们开展讨论和研究的基础。《辞海》对“汉奸”这一词条的定义我认为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把汪精卫等汉奸及其政权称为“汪伪”是合适的，因为“伪”是“非法的；窃取政权，不为人民所承认的”^②的意思。

当年汪精卫投敌，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愤言：自现在开始，在抗战胜利前，谁言和平，谁就是汉奸。不了解陈嘉庚说这话的背景，很容易发现其逻辑上的欠妥之处。但在当时，人们却为这一掷地有声的话击节叫好。

抗战过去几十年了，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讨论“汉奸”的语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个别欧美学者开始质疑将汪精卫等视为汉奸的合理性。他们发现自己很难对一个冒着丧失政治生命和肉体生命双重危险、自称去敌占区

① 《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886页。

② 《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第223页。

救民于水火的汪精卫以极其贬义的词加以称呼，他们更倾向于用“合作者(Collaborator)”、顶多是“傀儡(Puppet)”去称呼汪及其同类。他们还举例说，印尼著名政治家苏加诺在战争期间跟日本占领军密切合作，战后却被视为“国父”。

今天，这样的说法，在海外以及中国台湾的年轻一代学人中，获得不少首肯。一些年轻学者把抗战时期的汉奸视为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企图建立自己独立政治体系的第三势力，认为汪精卫政权是与延安、重庆并列的政权。他们把认定汪精卫集团、汪政权为“伪”的看法归结为以共产党或国民党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史观所致。

这样的讨论延伸到今天的一些时髦话题中。比如，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如果不是，那么秦桧还是不是汉奸？阿富汗战争中与美国合作的北方联盟是不是“阿奸”？伊拉克战争中与美军合作的是不是“伊奸”？为什么战后法国有“法奸”，而德国却没有“德奸”一说？为什么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和东南亚、称赞美国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造”的日本人也不叫“日奸”？李鸿章奉清廷之命签署《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是不是汉奸？回答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历史、道德和价值判断，于是，“当日本人用枪指着他，逼他当汉奸，他应该选择死亡，还是选择合作”之类的问题也提了出来，其潜台词显然是：战争中，到底是人的生命更宝贵，还是政治节操更重要（事实上，抗战期间，知名的汉奸很少是在日本人的刺刀威逼下落水的，他们的状态是争先恐后）？

这样的问题确实很难回答，但始终选择不回答，并不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正如以美国历史学家 Paul A. Cohen 为代表的一些海外学者所觉悟的那样，研究中国问题，应有“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态度，并且深入到当时历史的客观语境中去，与其他国家进行简单的对比不是观照中国历史的科学态度。毋庸置疑，汉奸在抗战时期的中国社会是客观存在，对这一客观存在我们没有忽视的理

由——如果汪精卫的投敌可以“理解”，那么整个抗战便失去了意义，中国人数以千万计的人员伤亡、数以千亿美元计的财产损失以及现代化进程的严重受挫便被消解得毫无价值。以所谓“学术研究”的名义替汪精卫及其同类的叛国行为辩护乃至“翻案”，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苟同的。我们的看法是：在日本人的刺刀下，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不当汉奸的责任。而这一以国家利益为取舍的价值标准并不是孤立的，美国民族英雄内森·黑尔被英军处死前说过的一句话——“我遗憾只能为我的祖国奉献一次生命”，至今仍然是美国人为之感动泪下的经典。

但是我们觉得，对汪精卫及其同类确实有深入、乃至重新进行学术研究的必要。这是因为，我们多年来已经习惯脸谱化地对汉奸、伪军、伪政权问题加以“总之”式的概括，对当中复杂、诡谲的问题大而化之。以至于对汉奸的构成、心理状态、意识形态、组织结构、控制体系、统治模式、对中国社会多方面多层次的影响等，甚少进行深入、理性和客观的阐述与分析。基于此，我们选择对汉奸相对集中的华东地区进行深入研究。当然，选择华东地区的日伪关系进行研究，还有其他一些学术上的考虑。比如，东北日伪结合程度甚高，伪满洲国采取了迥异于战前东北的政治形式，东北中共力量较弱，华北汉奸政权对国民党政治强烈排斥，其汉奸首脑人物多为北洋余孽，其军事力量较弱，等等。这与从国民党集团中分裂出来、带着孙中山思想外壳、以“国民政府还都”形式当汉奸的汪精卫集团有很大的不同。

我认为，通过对华东地区日伪关系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抗战时期日本统治中国的模式和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有助于我们解构将日伪习惯性地视为铁板一块的利益共同体的成见，有助于我们分析中国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各种政治力量消长的原因和方式，从而为中国在抗战胜利后急转直下的政治局势提供更多的理论和实证解释。

为了说明我们研究的价值,有必要先简要介绍海内外近年来对华东汉奸研究的状况。

在海外,北美一直是研究华东汉奸较多的地方。1972年,John H. Bolye 出版了《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1945: 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已经有中译本),这是一本在海外学界产生很大影响的著作。今天,海外史学界在“汉奸”这一话语之外解释汪精卫等人的政治活动,与此书有很大的关系。在我们看来,John H. Bolye 对日本全面侵华后石原莞尔等对华“缓和派”思想的强调,以及对汪精卫等人著述、讲话的纯粹文本解读,忽视了战争过程中“汉奸”这一话语和政治界定的实际存在,以及对当时政局的巨大影响。换言之,作者陷入相关人物的自我言说中,而对生动、复杂的历史实践重视不够。同年,Gerald E. Bunker 发表《The Peace Conspiracy: Wang Ching-Wei and the China War, 1937—1945》。^①

1980年,易劳逸发表论文《一项暧昧关系的诸面相:战时的走私、傀儡与屠杀,1937—1945》,与他的一贯风格相应的是,易劳逸把视角投向了国民党的“伪化”、沦陷区和国统区的非法贸易、日本对沦陷区民众的严酷控制,讨论了民族主义在当时的实际影响和中国各阶层在抗战过程中的实际表现。其中,易劳逸在论文中对国民党在动员民众不力、政治腐败、官员麻木等方面的批评,与他后来的几部著作是一致的。

也许是因为资料和方法论上的局限,对华东汉奸的研究在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停滞以后,自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尤其是美国)学者突然把注意力集中到上海。1996年,Poshek Fu(傅葆石)出版了《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① 关于欧美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参考了王克文《欧美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的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一书。该书把注意力集中在战时上海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的“政治暧昧性”上,以知识界在战时的表现为中心,涉及物价和经济,透视了日本统治下民众生活的实态,分析了政治选择的制约因素。Frederic Wakeman Jr.(魏斐德)在海外汉学界具有重要影响。他在1996年出版了《The Shanghai Badlands: 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 1937—1941》,对战时上海租界里的反日、亲日势力的争夺,以及租界当局的左右为难等历史问题进行了探讨。Parks M. Coble(小科布尔)继续讨论上海资本家和统治者的关系,发表《Japan's New Order and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Collaboration and Conflict, 1937—1945》、《Life in a Divided City: Chinese Capitalists in Shanghai》、《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Chinese Capitalists and the Japanese, 1937—1945》等系列论文。王克文的论文《通敌者与资本家:战时上海的物资统制, 1937—1945》,指出了战时上海资本家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忠诚之间的两难抉择,他将上海资本家、汪伪和日本放在三角关系中加以描绘。1998年, Wen-hsin Ye(叶文心)主编了《Wartime Shanghai》,内中收录了傅葆石、魏斐德、小科布尔、Marie-claire Bergere、Joshua Fogel 和 Benard Wasserstein 等人对战时上海的研究。此外,学者们对战时上海文艺似乎也产生了相当的兴趣,并有较多论文发表。

除此之外,专门研究华东汉奸的欧美学者论著有 Han-sheng Lin(林汉生)的论文《Wang Ching-wei and Chinese Collaboration》、《Chou Fo-hai: The Diplomacy of Survival》、《A New Look at Chinese Nationalist “Appeasers”》,魏斐德的论文《Treason Between Ourselves: The Concept of Hanjia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Roger B. Jeans 的论文《Third — Party Traitors in Wartime China: The Case of the National Social Party of China》, Brian Martin 的论文《Shield of Collaboration: The Wang

Jingwei Regime's Security Service, 1939—1945》，Timothy Brook (卜正民) 的论文《The Creation of the Reformed Government》、《1937—1945 年间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占领状态下的政权的形成》，R. Keith Schoppa (萧邦齐) 的论文《The Changing Face of Collaboration: Hangzhou, 1938—1940》，Youli Sun (孙有利) 的专著《Chin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1931—1941》中也有专门的讨论，等等。在这些专门论著中，王克文的《战争与和平：试论汪政权的历史地位》^①，极具争议。

加拿大学者 David P. Barrett (巴雷特) 的系列论文《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Wang Jingwei Government: Rural Pacification, the New Citizens Movement and the Greater East Asia War》、《The Wang Jingwei Regime, 1940—1945: Continuities and Disjunctures with Nationalist China》、《State Creation in an Ideological Vacuum: The Wang Jingwei Regime in Nanjing, 1940—1945》、《Propaganda and Censorship under the Wang Jingwei Government (1940—1945): How Authoritarian a Regime Was It?》等在欧美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巴雷特将汪伪与战前的国民政府进行比较，指出它们的许多相似之处，如反共的意识形态，个人独裁，派系林立，社会基础薄弱等。他还将汪伪与欧洲同时期的傀儡政权进行比较，认为欧洲傀儡政权攻击战前政府的左倾和腐败，以法西斯“新”思想号召群众；汪伪则竭力争取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正统”，强调其对以前历史的继承，因此承袭了不少战前政府的意识形态、组织、结构等。巴雷特还在研究中提及海峡两岸史学界对汉奸问题的敏感和回避。

① 王克文主讲、林敏秋整理记录：《战争与和平：试论汪政权的历史地位》，（台湾）《“国史馆”馆刊》（复刊）第 22 期。

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①也比较突出。日本的诱和工作与汪精卫发起“和平运动”似乎是热点之一，主要著作有卫藤沈吉的《对华和平工作史》，秦郁彦的《日华事变——围绕和平工作与讲和条件》，户部良一的《和平试探者——支那事变和平工作的群像》，《对中和平工作 1942—1945》，《陆军“支那通”与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否认论的源流》，《支那事变与和平工作——是什么妨碍了早期终结》，刘杰的《汪兆铭政权之树立与日本的对中政策构想》，伊原泽周的《近卫内阁与汪精卫的重庆脱出》，土屋光芳的《汪精卫与“和平运动”政策——从高宗武的角度来看》，《汪精卫与“政权树立之运动”》，《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与“大亚洲主义”》等。

汪精卫政权的实质及华东沦陷区的社会、经济面貌是研究者们关注的另一个热点。主要相关著作有安井三吉的《日本帝国主义与傀儡政权》，利谷信义的《“东亚新秩序”与“大亚洲主义”的交错——汪政权的成立与其思想的背景》，伊东昭雄的《“大亚洲主义”与“三民主义”——有关汪精卫傀儡政权下的诸问题》，土屋光芳的《对于汪精卫的民主政治论的考察》，柴田哲雄的《汪精卫南京政府下的东亚联盟运动与新国民运动》，古厩忠夫的《汪精卫政权不是傀儡政权吗？》，《“汉奸”的诸像——关于汪精卫政权》，《日中战争与占领地经济——华中有关通货与物资的分配》，《对华新政策与汪精卫政权——从军配组合到商统总会》，久保亨的《战时上海的物资流通与中国商人》等。

日本学者对日伪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所谓“外交”领域，主要著作有三谷太一郎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下的日中战争外交》，波多野澄雄的《太平洋战争与亚洲外交》，Yoji akashi 的《一次笨拙的和平努力：缪斌工作，1944—1945》等。重光葵的《日本侵华内

^① 关于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参考了许育铭《日本有关汪精卫及汪伪政权之研究状况》，《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

幕》和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大本营陆军部》中，亦有概要的叙述。

日本学者的研究，继承了其学界史料工夫扎实、广博的传统，一些年轻学者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的方法介入历史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我们认为，上述研究成果中，大多数是以“日本的视野”来看待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历史事件，其中部分研究明显受到日本意识形态的影响。

裴京汉的《汪伪政权与“大亚洲主义”》是我目前所知惟一的韩国学者的相关研究。

在中国台湾，不少学者对华东汉奸颇有研究。蒋永敬、邵铭煌、罗久蓉、陈木彬、刘熙明等人较为突出。蒋永敬在民国史研究领域内的诸多方面均有重要贡献，华东汉奸问题只是他丰硕著述中的一小部分。他撰写的《蒋中正先生与抗日战争》、《汪精卫〈举一个例〉所涉“机密”之真象》、《玩火自焚的国民党接班人——汪精卫》、《论李登辉与汪精卫“世代交替”之比较》、《胡适与汪精卫——抗战前后对中日问题的讨论》、《汪精卫的“恐共”与“投日”》、《汪兆铭传》等均与华东汉奸问题相关。另外，他主编的《近百年中日关系论文集》，则收录了多篇相关的重要论文。罗久蓉的重要论文《历史情境与抗战期间“汉奸”的形成——以1941年郑州维持会为主要案例的探讨》，虽非专门研究华东汉奸，但其对汉奸生成过程中具体社会环境和历史情境的影响的讨论，对我们研究华东汉奸的心态和形成，显然是有借镜作用的。邵铭煌的论文《日本最后求和的幻梦：缪斌工作》，讨论了“缪斌工作”失败的4个原因，揭示了抗战结束前复杂的中日关系。陈木彬的《从函电史料观抗战时期的蒋汪关系》，运用大量台湾地区所藏的一手资料，对蒋汪之间扑朔迷离的关系作了详尽的解剖。刘熙明在最近出版了《伪军——强权角逐下的卒子》一书，该书搜罗了大量资料（尤其是中国大陆虽已公布、但不被研究者看重的资料），对抗战时期伪军的来源、结

构、内部控制及消亡作了详细的描述；对伪军周旋于日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企图实现自身目标但终归失败的历史进行了分析。该书将汉奸视为国共之外有自己抱负和理想的独立政治实体。我认为，作者对许多史料的挖掘是有价值的，但他的许多论点并不能从该书所引的资料中得到证实。

在中国大陆，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整理收集华东汉奸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论著的重要时期。蔡德金、黄美真、余子道、张云、闻少华等人为打破华东汉奸问题被史学界“故意”忽略的尴尬局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其重要著作和论文有：《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汪伪政权研究论集》、《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黄美真、张云）、《历史的怪胎——汪精卫国民政府》（蔡德金）、《汪伪二号人物陈公博》（蔡德金）、《汪精卫传》（闻少华）、《周佛海评传》（闻少华）、《陈公博传》（闻少华）、《汪精卫评传》（李理、夏潮）、《汪精卫叛国前后》（王云高）、《关于抗战时期汪精卫及汪政权的几个问题之我见》（蔡德金）、以及《汪精卫叛逃与龙云》（蔡德金）等。在这里，要特别推荐的是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的一些年轻研究生近年来研究华东汉奸所取得的独特研究成果：如潘敏的《沦陷时期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以苏南、苏中为中心（1938—1945）》（博士论文），李峻的《日伪统治上海实态研究（1937—1945）》（博士论文）等。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海内外有关华东汉奸的论著中，专门论述华东地区汉奸与日本之关系的很少；而且，这些有限的论著没有着眼于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军与华东汉奸及其政权的关系，也忽略了对华东日伪关系全面的论述；更重要的是，对制约华东地区日伪关系具体形态和发展趋势的诸因素没有全面的分析。而我们的初步研究则发现：华东日伪的复杂关系体现在几乎每一个历史层面，制约其关系的因素多样且互相牵制。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华东日伪关系复杂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容研究者

错过。

2003年6月,在“非典”(SARS)肆虐告一段落的时候,我们初步完成了对华东地区日伪关系的整体研究。我们的研究是尽心尽力的,但由于水平所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衷心期待着大家在学术上的针砭和帮助。

张 生

2003年6月20日

目 录

(1)	导 论
(1)	第一章 引子:中国历史上的汉奸现象及其影响
(25)	第二章 抗战爆发后日本利用奸伪的策略、政策以及华东地区汉奸的泛起
(25)	第一节 抗战爆发后日本利用汉奸的策略和政策
(34)	第二节 华东各地汉奸的泛起和伪政权的建立
(47)	第三节 华东地区汉奸群体构成及其动机、心态分析
(66)	第三章 华东地区日伪关系实证研究之一——以“清乡”为例
(66)	第一节 合作与冲突的理论分析
(70)	第二节 “清乡”的目标及其发起
(79)	第三节 “三分军事”
(91)	第四节 “七分政治”
(103)	第四章 华东地区日伪关系实证研究之二——以“粮食政治”为例
(105)	第一节 面对米粮统制权的日、汪——机构和政策
(123)	第二节 “民间统制”与米粮统制的失败

- (140) 第三节 国、共、日、伪竞争中的粮食
- (155) 第五章 华东地区日伪关系实证研究之三——以伪上海
市政权为例
- (155) 第一节 日、伪控制上海的认识、设想
- (161) 第二节 上海地区汉奸来源举隅
- (166) 第三节 伪市府组织与伪市长的更迭
- (177) 第四节 日本对伪方的控制
- (185) 第五节 上海地区日伪矛盾
- (196) 第六章 华东地区日伪关系实证研究之四——以李士群
特工势力的兴亡为例
- (196) 第一节 伪特工政治的兴起
- (206) 第二节 日本“以特制汪”政策的运作与汪伪的反制
- (225) 第三节 日本对汪伪政策的转变与李士群势力的消亡
- (240) 第七章 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对日伪关系的影响
- (240) 第一节 国民政府的政治影响对日伪关系的制约
- (259) 第二节 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对日伪关系的制约
- (269) 第三节 国民政府在金融方面对日伪关系的制约
- (285) 第八章 中共对日伪关系的制约
- (285) 第一节 “白皮红心”
- (295) 第二节 “打中有拉，拉中有打”
- (308) 第三节 国共关系对日伪关系的制约
- (321) 主要参考资料
- (337) 后 记